

线的一个标志。许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汽车只能帮我们转移演出地点，但不能代替我们转移立足点”，表示一定要把革命的扁担永远挑下去。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立足点的转移，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正是由于努力实践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我们才有了一些进步，受到工农兵群众的欢迎。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鼓吹“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时，胡说什么“广大工农兵对文艺现状不满”，这真是颠倒黑白。他的罪恶企图是要篡改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把文艺重新扭回到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的邪路上去，使文艺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革命文艺战士决不答应。我们决心永远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在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继续转移立足点，永远服务工农兵。

笔卷惊涛颂风雷

——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短篇小说

中文系74级二班评论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十年的光辉历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天，祖国旧貌变新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正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但是，肯定还是否定这场政治大革命，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因此，通过文艺的形式，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深刻揭示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意义，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广大文艺创作者面前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短篇小说集《迎着朝阳》（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盛大的节日》（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以及收在朝霞丛刊《序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和发表在其他报刊杂志上的不少短篇小说，为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洋溢着无产阶级战斗激情的作品，犹如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一幅幅壮丽的画图，把我们带回到文化大革命中那如火如荼、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这里有运动初期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旗向走资派进攻的《暴风雨》（《迎着朝阳》）、《迎着暴风雨》（《长江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有一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的《初春的早晨》（《序曲》）、《工地战旗红》（《武汉文艺》一九七四年第三期），有工人阶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序曲》（《序曲》）、《烈火熊熊》（《盛大的节日》）；有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的《第一课》（《序曲》）、《雨后初晴》（《迎着朝阳》）；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新生的革委会成立后斗争仍在继续的《前进，进！》（《序曲》）、《汽笛声声》、《纳新》（《迎着朝阳》）、《金钟长鸣》（《序曲》）。

它们各自虽只截取了这场伟大斗争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片断，但汇集起来却反映了运动的全过程，展现了革命风暴席卷工农各条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风貌。这些作品以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牢牢把握运动的本质和主流，深刻揭示了开展这场斗争的及时性和必要性，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派的斗争，塑造了闪耀着文化大革命精神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因而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战斗性。

深刻揭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和必要性

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艺作品反映文化大革命，必须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充分揭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和必要性。这些短篇小说，正是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从不同阶段，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一思想，从而歌颂了文化大革命。《浪尖上的闪电》（《盛大的节日》）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取材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时某港口引航站里的斗争生活。作品通过青年引水员程耿和引航站领导人蒋维在引不引一艘西非远洋货轮进港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鼓舞下，程耿等工人出身的青年引水员为了克服进出口船只压船压货的被动局面，要求引领万吨轮。程耿的革命要求，不仅得不到蒋维的支持，反而受到排斥和打击。因为在蒋维的眼里，象程耿这样的工人引水员根本就没有条件引领万吨轮。他顽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重视和依靠“当过十八年船长，英国皇家海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戴林这样的反动技术权威。他和戴林互相勾结，把持引航大权，完全剥夺了工人引航员干社会主义的权利。当一艘西非国家的远洋货轮“海狮”号在海上遇到特大风暴，断了双锚，要求立即把它引进港时，蒋维、戴林一唱一和，抱定“断了双锚，不予引进”的条文，见死不救。并且利用条文，对要求引领的程耿等人实行管、卡、压。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程耿不顾蒋维的威胁阻拦，带领工人冒着强台风把“海狮”号安全引进港口，并收到它发来的感谢电报时，蒋维连看也不看，却无理没收了程耿的望远镜，命令他“停职检查”，妄图撤程耿的引水员职务。作品通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表明：象蒋维这样的人，“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站长，也不象是我们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了。”因为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所以这个引航站已“被蒋维、戴林这些老爷们盘踞着，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他们利用手中的部分权力，对工人引水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前进歌》（《武汉文艺》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则是通过史仁伯这样的反面形象，说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他们手中篡夺的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领域对无产阶级实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政权都掌握在蒋维、史仁伯这一类人的手里，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亿万革命人民，夺回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篡夺的那部分权力，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作品，正是从这一高度，揭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集中突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派的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不仅深刻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而且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文艺作品反映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一精神实质。上述短篇小说在反映文化大革命几个重大回合的斗争时，都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设置矛盾冲突的基础，特别是突出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走资派的斗争，从而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特征和规律。《暴风雨》描写的就是以革命造反派王海鹰为代表的革命人民和走资派何承秋的一场激烈大搏斗。王海鹰针对运动初期何承秋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捂阶级斗争盖子，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贴出了大字报，捅了这个“马蜂窝”，揭开了同走资派的矛盾。这个有“政治历史问题”，过去几次大的运动都避过了风头的何承秋，凭着反革命的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来临，也就愈作垂死的挣扎。他不仅亲自出马对王海鹰进行威胁，给王海鹰戴上“野心家”、“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指使南科长对这个青年工人进行威胁，妄图以“撤销预备党员”这根大棒来迫使王海鹰收回大字报。最后，竟利用职权，盗用党委名义强行取消关于讨论王海鹰的转正问题的支部大会。但是，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决不容忍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不管何承秋如何玩弄阴谋诡计和疯狂迫害，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海鹰始终没有屈服。他清醒地认识到，何承秋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一条反动路线；何承秋对他的迫害，也不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对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因此，王海鹰在斗争中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锻炼得更加坚强。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广大革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同走资派进行斗争的重大意义。《迎着暴风雨》中的七二四工地党委副书记、指挥长何平，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包庇过右派，反对过三面红旗，竭力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躲进疗养院逃避四清，这样的干部居然受到重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仅不痛改前非，反而大肆镇压敢于起来揭发他错误的群众。现实斗争使广大革命群众认识到，这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何平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台上有人，台下有人，上面有人，下面有人，是一条线呐！”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派。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只有同走资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突出同走资派斗争的同时，不少作品还反映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表现了文化大革命是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如《烈火熊熊》中披着工程师外衣的王辉礼，就是一个潜伏下来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钢铁铸》（《序曲》）中混进革命队伍的倪可夫，是国民党一个特务头目的儿子。《前进，进！》中的农场饲养连副连长朱阿富，是漏网的富农。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些阶级敌人，而是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这些阶级敌人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即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

本主义，以达到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的罪恶目的。这样写，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从这一侧面说明了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我们强调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不仅不放松而且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同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作斗争。走资派之所以成为走资派，很重要一条就是纵容、保护和支持这些人，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和愿望。文艺作品把社会上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与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结合起来写，就能更好地突出同走资派斗争。

热情歌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上述作品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歌颂，是通过塑造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体现的，它们特别突出展现了这些英雄人物大无畏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序曲》中的赵大梁，正是一个敢于顶着逆风恶浪同走资派进行坚决斗争，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英雄形象。这个大跃进时期才进厂的青年造船工人，在运动初期就揭露了走资派浦笑风大搞修正主义的罪行。对此，浦笑风惊恐万状，暗地蒙蔽了一部分群众把赵大梁围攻了一天一夜。但赵大梁考虑的不是如何为自己解围，而是团结同志坚守岗位，更顽强地和走资派进行战斗。这种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也激发出了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冲天干劲。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斗争中，他砥柱中流，肩挑革命和生产两付重担，依靠群众，及时完成了抢修“战斗号”和外轮任务，粉碎了浦笑风先用所谓抓生产来压革命，后用革命名义来破坏生产的种种阴谋。《暴风雨》中的王海鹰和《波涛滚滚》中的宋涛，也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正是由于这种反潮流精神，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冲破了一个又一个险滩暗礁，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反潮流精神，来源于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金钟长鸣》中的乔巧姑，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她在胜利面前没有忘乎所以，停止不前。她不仅坚决顶住了既是战友又是上级的郑老师下达的违背党的干部政策的错误命令，而且透过这场复杂斗争的表面，看清了这场斗争背后有人在“正面文章反面做”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英雄人物的反潮流精神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在乔巧姑身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一代新人的崭新风貌和崇高境界。在其他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乔巧姑式的人物。象《初春的早晨》中的郭子坤，作品不仅表现了他敢于和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反潮流精神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同时也展现了他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广阔的共产主义胸怀。郭子坤的这些优秀品质，在坚持革命的大联合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些作品通过对英雄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突出了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歌颂了文化大革命铸造了一代新人。走资派还在走，革命造反精神永不丢。革命文艺作品应热情歌颂无产阶级革命派敢于同走资派斗，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革命精神。

文艺作品反映文化大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广大工农兵的殷切期望。让我们以更好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问世这一实际行动，来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有力地反击右倾翻案风。